

战争、国家与性别： 抗战大后方的妇女节纪念

任祖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近代史系, 北京 102488)

【摘要】 抗战期间, 妇女节不仅是专属于女性的社会时间点, 还是动员妇女参与抗战的特殊场域。此时节日纪念主旨于女性群体自身诉求外, 加入了动员妇女支持抗战、宣传女性国家民族责任感等新内容。面对政府的宣传, 尽管群体内部因知识水平、社会阶层不同反响各异, 却也激励了相当数量的女性投入救亡工作。在她们看来, 即便立足于妇女权益, 支持抗战也是争取妇女解放的有利契机, 两者相辅相成。由于节日纪念的普及, 政治功能外的社会意义也有一定呈现。纪念仪式及相关象征符号, 持续地向人们传递现代化的政治、社会理念, 而为增强节日吸引力举办的种种休闲庆祝活动, 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妇女的群体认同意识, 传播了现代性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 妇女节; 纪念仪式; 社会动员; 宣传教育; 休闲庆祝

【中图分类号】 K265.9 **【文章编号】** 1002-3054(2016)02-0120-0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160217

中国于1924年首次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妇女节都发挥着相当的功能、作用。对于这一重要节日的研究价值学界早有重视, 尤其是它所代表的革命传统及政治功能意义受到较为集中的关注。^[1] 本文拟考察抗战大后方的妇女节纪念活动。之所以选择这一具体研究对象, 一是因为目前学界尚未对此时段大后方妇女节纪念进行深入研究, 仅有的成果只是在论述节日的总体变迁时顺带提及。其实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当时节日的主旨、纪念方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正是伴随着政府的介入, 节日更多地进入到基层社会, 其效果如何, 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值得探讨。二是目前针对抗战时期社会群体性纪念日的研究还比较少, 既存研究多集中于对一些政治性纪念日政治内涵、动员效果的探究。^[2] 虽然此时政治性纪念日的作用比较突出, 但社会群体性纪念日却具有更为复杂的意义面向, 能够涵盖政治与社会两个领域。^[3] 就妇女节来说, 它毕竟是针对女性群体、提倡妇

女解放的现代性纪念日, 既有政治内涵, 也有社会意义。对于妇女节在近代社会生活领域中扮演的角色, 目前学界关注甚少, 对此加以探讨, 有利于观察民族危机之下政治性因素对社会生活的浸透。职是之故, 笔者尝试从抗战大后方的妇女节纪念活动入手, 考察特殊时期、特定地区妇女节的主旨、仪式、宣传措施、娱乐方式, 关注节日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多重联系, 力图勾勒战争环境下国家与女性群体的互动图景。

一、国家与性别：

抗战背景下妇女节纪念主旨的调整

1924年3月8日, 广州公开举行了中国首次妇女节的纪念活动。当天有千余人参加大会, 何香凝、廖仲恺、曾醒相继发表演讲, 会后还组织了游行。^{[4](P204)} 据时任妇女部长何香凝的回忆, 妇女节是由鲍罗廷夫人介绍传入中国, 当时举行纪念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开展妇女运动。^{[5](P900)}

【收稿日期】 2015-09-08

【作者简介】 任祖凤(1986-), 女, 云南文山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

鲍罗廷夫人还专门撰文介绍纪念妇女节对国民革命具有重要作用。^[6]可见，妇女节传入中国与当时的妇女运动、革命动员密切相关。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在此外部条件下，官方与民间的妇女节纪念在内容、形式上出现分化的趋向。官方主导的纪念活动，政治色彩依然浓厚。此期间国民党妇女会仍延续着大革命时代的传统，他们发起的妇女节纪念旨在宣传官方政治理念。如1929年节日当天发表的《为国际妇女节告女同胞书》就要求妇女信仰三民主义，拥护中国国民党。^[7]此外，妇女会的纪念活动还积极呼应、执行政府发起的社会运动，如1934年国民政府发起国货运动，该年的妇女节联欢会大力提倡购买国货。^[8]

当时除了国民党妇女会，民间妇女团体也举办相关纪念活动。例如1931年女青年励志社于复旦大学礼堂举行纪念大会，邀请名人演讲。该社会员多为复旦大学女生，在她们发表的宣言中透露出一种责任意识，即由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带领广大劳动妇女求解放。^[9]在民间社团主导的节日纪念中，更多关注的是妇女本身的利益，以及妇女群体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的定位，而非主要聚焦于国家和政党的政治需求。

正是由于妇女会与民间团体各行其是，此时的节日纪念主旨和形式呈现分散、多样的特性。尽管如此，仍可说不同时期的妇女节不同程度地带有政治色彩，毕竟近代的妇女运动是在国族建构的大语境下展开，它与国家、民族的未来息息相关。民间团体以关注女性自身利益为主的趋向，只是相对和平稳定时期的暂时现象。

随着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当国家、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妇女节再次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当时著名的妇女运动者都强调妇女节具有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增强抗战力量的重要意义。时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的史良在纪念节日的相关文章中强调，如果政府不发动妇女参加抗战，中国就会损失将近一半的抗战力量。^[10]何香凝则认为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关键时刻，妇女节应成为一个斗争节、动员节。^[11]此外在官方散发的妇女节宣传大纲中，随处可见“动员妇女参加抗建工作”“争取抗战民族的最后胜利”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12] (P3-4)}一时间，发动妇女支持抗战已成为妇女节的首要任务。

为了配合节日主旨的上述转变，时人通过相关理念阐释为妇女参与抗战提供了正当理由。当时最常见的思路是强调妇女作为国家的一员，理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甚至借由传统观念资源，提出“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新口号。^[13]于是，凸显妇女对国家的责任成为动员其参加抗战外，妇女节纪念的另一宣传重点，^[14]“坚持抗战、保卫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被界定为妇女应尽职责。^{[15] (P1)}

可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妇女群体的特殊性被取消，无差别的国民身份彰显。妇女节的原有主旨——妇女解放与妇女利益，在国家、民族危机前似乎已含有“一己之私”的意味。那么，它们在节日纪念中该处于何种地位，如何呈现？事实上，所有的节日纪念组织者都认为二者相辅相成，并非对立。在立足国家利益的政府宣传中，依据责任与权利相互关联的认识，强调妇女对国家尽责，将有助于达成自身的权利诉求。由此，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可实现自身解放的逻辑关系，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16] (P4)}宋美龄就曾谈到英国妇女获得参政权，是由于一战时期她们对国家尽责尽力，因此抗战期间是中国妇女争取自身权利的最好时机。^[17]

与上述由国家而妇女的利益关注顺序不同，更多的声音是沿从妇女到国家的思路进行言说，充分强调节日原有主旨对宣传动员新任务的辅助、促进功效。例如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战时妇女运动的总机构）散发的节日传单中就要求政府实现职业、教育上的男女平等和改善妇女生活，这些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动员妇女。^{[18] (P1)}也有运动者建议政府如果要发动农村妇女参加抗战，就必须提高她们的待遇，改善她们的生活，减轻她们的负担。^[19]媒体则呼吁只有缓解劳动妇女的生存压力，才能帮助她们摆脱家庭的束缚来关注国家与民族。^[20]虽然三者的说辞大同小异，但关注重心还是有所不同，妇女运动者侧重妇女权利，而另外二者则突出动员效果。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一些妇女运动者的言说仍旧与众不同。例如著名妇女运动领袖李德全就指出：“抗战的烽火也为我们中国妇女烧断了几千年来束缚着的铁链，照亮了争取解放的光明前

路。”^[21]抗战成为了工具性的存在,女权主义仍旧是终极关怀。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战争使得女性与国家较之以往更为紧密联系起来的背景下,支持抗战是争取妇女权利与解放的有利契机,仍是妇女运动者的主流认识。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妇女节将妇女运动与战争、国家民族的未来联系在一起,此时的节日内涵较之以往更为丰富。节日在原有宗旨基础上,新加入了动员妇女支持抗战,强调女性对国家、民族的责任这两点内容,且重要性超过原有宗旨。对于这一变化,妇女运动者主要持肯定态度,认为参与抗日救亡的工作有利于改变社会对女性的看法,事实上抗战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促进了妇女的解放。

二、妇女节的纪念仪式与主旨表达

纪念仪式是表达节日主旨的主要途径,人们对节日意涵的认知更多依靠这一重要媒介。以此为考察对象,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节日的传播功效。抗战时期,与节日主旨的改变相呼应,政府介入到节日庆祝的组织、策划,以期充分展现节日意涵、实现理念传播,受此影响,节日纪念仪式趋于成熟。

此期间纪念仪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一方面,节日的纪念活动由固定的机构——妇女节筹备会负责,其成员主要来自各个妇女团体及有关机关、社团、学校等。^{[22](P1)}以陪都重庆的筹备会为例,它的任务包括:确定每年纪念活动的中心工作,筹集活动经费,将工作人员分成总务、宣传、游艺、动员四组并明确各组人数、任务,决定开会地点、大会名称、主席团成员等。^{[23](P1-2)}正是妇女节筹备会的组织、策划,将不同性质的妇女团体及其他社会力量整合在一起,从组织上保证了节日纪念由分散走向统一。

另一方面,节日的指导性纪念办法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负责统一拟定,具体内容大概包括:①召开妇女节纪念会;②举行音乐、游艺、歌咏表演或妇女工作成绩展览会;③出版各种纪念刊物;④慰问出征军人家属;⑤发起妇女工作竞赛等。此外,官方还颁布了节日的宣传要点,致力于对宣传内容的规范、控制。^[22]上述规定中前三项在1937年以前就曾出现过,而四、五两项则是

抗战时期的特殊产物。这显示了当时官方纪念办法力图在继承与调整相结合的基础上,创立节日纪念的规范化流程。同时,从纪念内容中对妇女工作(物资生产)、军属慰问的重视,也可以明了国民政府对妇女节价值的关注所在。

由于抗战局势的危机,加之节日筹备和运作皆受政府管控,抗战主题在具体纪念仪式中得到集中、程式化地呈现,下面以具体事例对此加以说明。1938年长沙纪念会场贴满的各种抗战标语,四周悬挂的大幅壁报、宣传画,共同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氛围。参加此次纪念会的有女学生、女职员、家庭妇女及难民代表共两千余人。大会开始前,与会者高声唱着抗战歌曲,歌声中的激昂情绪让列席的记者感叹有点像“马赛大革命”。随后,各机关代表、妇女运动者相继演说,他们都勉励妇女担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争取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最后还表演了话剧。会后,记者乐观地评价道,这次大会让之前不明了节日意义的妇女认识到,节日与她们有关,也与抗战有关。^[24]同年,在敌机轰炸后的浙江萧山,全城已是一片废墟,但这里仍举行了妇女节纪念大会。参加者都是罹难同胞遗孀,她们对侵略者的愤怒使大会带有强烈的抗战色彩,全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闻者为之动容。^[25]

除文字记录外,当时留下的照片也颇能反映出纪念大会庄严隆重的氛围。图1展现的是1939年西安的妇女节纪念大会场面,时人描述虽有日军空袭的危险,但盛况不亚于陪都重庆。^[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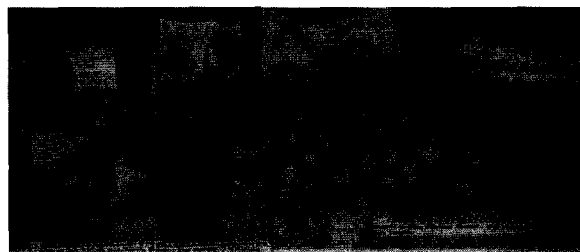


图1 1939年西安妇女节纪念大会

抗战期间每年例行举办的妇女节纪念仪式效果如何?一般性影响是,在每年的纪念仪式上,不同年龄、职业的妇女聚集在一起,相互交流,塑造、凝聚着群体的认同感。而有规律的纪念活动及对主旨的反复言说,则将妇女解放的理念传

递给每一位参与者。^{[27](P404)} 时人对此就曾评价说：“使妇女感觉到自身存在之价值，而且对人类社会能作有价值的贡献，‘三八’对此实有无比的功绩。”^[28]

至于抗战宣传动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借由仪式营造出的浓厚抗战氛围，国民政府向妇女宣扬国家、民族意识，勉励其担负起对国家的责任，而妇女们也在仪式中受到感染，并通过种种实际行动表达支持抗战的决心。例如1941年重庆的妇女节纪念会举行抗战募捐活动，与会妇女都积极响应，数个工厂的女工捐款总数都在千元以上。在记者看来，这意味着虽然生活艰辛，但女工已经走出家庭的小圈子，关注更大范围的国家、民族利益。^[29]

三、妇女节的基层宣传与社会动员

上文探讨的是材料相对丰富的大城市。为了获得更为全面的认知，接下来笔者试图勾勒基层妇女节的纪念状况。

妇女节是舶来品，与中国社会本无多少联系，基层民众对它不甚了解，也很少参与。这一情形在抗战时期有所变化。受节日纪念官方化影响，当时大后方的各级政府多按时举行纪念活动，且发动妇女会会员和女学生走进城乡，扩大节日宣传。在官方层面的主持下，妇女节得以在内地、基层、非知识女性这样更广的范围内传播。

那么，节日纪念的推广依靠的是怎样的具体措施？在召开妇女节纪念会时，为了能让更多的家庭妇女、劳动妇女参加，国民政府要求各保甲长、警察逐户动员，有时甚至硬性摊派参会人数。如1940年，重庆市政府命令“各保长会同所居各甲长挨户催促，务求全体妇女参加”。^{[30](P1)} 1942年长沙的妇女节筹备会也请各保、甲长动员辖区内妇女到场。^[31] 1944年，重庆各区上报出席的人数有200人至90人不等，第六区甚至要求每个镇至少有50人参与大会。^{[32](P1-6)} 一些县、乡镇也有类似规定。例如四川黔江县要求城内年满12岁以上的女性都出席大会。^{[33](P81)} 北碚澄江镇通知每户至少派一位妇女参加纪念。^{[34](P1)} 巴县蔡家乡也有动员家庭妇女的规定。^{[35](P1-2)} 经过上述努力，出席纪念大会的妇女来自各个阶层，突破了之前多为知识女性的局限。如1939年重庆的纪念会除职

业女性、女学生外，也有许多家庭妇女、劳动妇女参加。^[36] 虽然是官方强制要求，家庭妇女、劳动妇女被迫卷入，但在客观上有利于妇女节的进一步传播。

除政府对参与人员制度化的规定外，还有其他一些灵活的宣传方式使妇女节在空间维度上得以拓展。首先是在节日当天组织者都会散发大量的传单，其中多带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将妇女解放、新女性的塑造与国家、民族联系起来。例如四川新繁县号召“妇女界的同胞一致奋发起来参加抗战，分担男同胞的工作”。^{[37](P62)} 永川县要求妇女牢记自身解放是民族解放的一环，妇女要想获得真正永久的自由平等，就应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37](P82)} 绵竹县则推广新女性的标准：积极奋斗、努力学习充实自己、服务社会、具备国家民族观念。^{[37](P90)} 可见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带有混合包容的特性，即将妇女群体的独特要求与国家、民族的普遍利益结合在一起。

在基本的文字宣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流行的宣传方式。首先，当时基层社会识字率低，口头宣讲无疑是向民众进行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妇女会会员和女学生在这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们积极组成演讲队，分赴各地演说。例如重庆忠县女中的宣传队在附城一带讲演，她们以乡贤秦良玉（明末抗清女将）为模范，号召妇女积极抗日。^{[33](P38)} 四川什邡县的妇女会会员则于3月9日（9号为当地赶集日，便于宣传）在城厢内外讲述妇女节的意义，接着她们又连续三天到附近乡镇宣讲，取得了不错效果。^{[33](P51)} 其次，每年的妇女节都会有相关的广播节目播出。例如1942年的节目是妇女问题座谈会，国民党的妇女运动者沈蕙莲、刘蕙静、张默君等人相继演讲，内容涉及民族、国防、经济、职业平等方面。^[38] 第三，为进一步发挥动员功效，有些地方还自行创造节日纪念歌曲。如四川大竹县自创的妇女节歌《三八纪念歌调》，歌词简单直白，曲调激昂，颇能增强节日的感染力。^{[37](P51)}

以上宣传方式在基层社会中的实行、落实情况如何？四川省档案馆馆藏的1943年四川部分县妇女节纪念情形汇报书，^{[37](P1-105)} 为我们提供了基层社会中节日的传播方式及社会效应方面较为全面的信息，见表1。

表1 1943年四川省妇女节纪念大会与宣传方式概况表

续表

县名	参加大会人数	宣传动员方式
梓潼	1000余人	游行,散发纪念特刊,张贴标语,绘制壁报
庆符	500余人	各校同时举办母亲联欢会
彭山	2000余人	游行,张贴标语、壁报,散发告妇女书,表演游艺
合江		遵照指示办理
自贡	500余人	妇女会组织宣传队、慰问征属,妇女座谈会
江安	1000余人	分组出发宣传、发行特刊,散发标语、传单,慰问抗属
开县	1000余人	举办母教座谈会、音乐话剧
古兰	500余人	绘制壁报、漫画,组织宣传队
乐山		仅举行纪念会
南部		扩大宣传
中江		举行座谈会,表演抗战游艺,是日女工休息一日,工资照发
荣县		编发特刊,绘制壁报
宜溪	1000余人	编发特刊和画报
纳溪	200余人	印发特刊
璧山	1000余人	各种球类比赛、话剧表演、演讲竞赛,绘制壁报、漫画,张贴标语
叙永		演讲比赛、扬琴表演,散发标语、绘制壁报
长宁		遵照指示办理
井研	男女 100余人	张贴壁报、标语、漫画,召开座谈会
新津		在城乡各地宣传
资阳		座谈会、表演音乐剧,组织宣传队宣传
沐川		令各乡镇分别举办
盐亭		中小学女生爬山及球类比赛,绘制壁报,妇女问题座谈会
剑阁	700余人	散发标语、绘制壁报
大竹	200余人	组织宣传队,印发宣言,张贴标语
峨边	200余人	绘制壁报、举行座谈会。是首次纪念妇女节
奉节		学校举办母亲联欢会
温江	700余人	举行演讲比赛、座谈会,散发标语,印发漫画特刊、绘制壁报
新繁		举行演讲比赛
阆中	到900余人	举行演讲比赛,由妇女会领导女学生沿街宣传,绘制壁报、漫画

县名	参加大会人数	宣传动员方式
大足	500余人	遵照指示办理
通江		遵照指示办理
巫溪		仅举行纪念大会
南江		举行母教联欢会,发行特刊
永川		游行、散发纪念宣言
巫溪		中、小学举办母亲联欢会
雷波		照纪念办法及宣传要点办理
绵竹	3000余人	举行座谈会,表演音乐话剧,绘制壁报、漫画,印发大会宣言
邻水		妇女工作成绩展览会,表演音乐话剧,演讲比赛,绘制壁报,印发特刊
郫县	500余人	绘制壁报,散发标语,举办音乐会
简阳	3000余人	举办母教运动座谈会
犍为		遵照要点办理

从表1可看出,各县在妇女节当天基本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有些县的出席人数甚至多达千人。除召开纪念会外,各县大多有文字及口头宣传,部分县还举办妇女运动座谈会、游艺表演、演讲比赛、体育竞技等活动来吸引妇女参加,烘托节日气氛,以便达成员广大妇女支持抗战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县是在抗战时期才首次纪念妇女节,甚至重庆也是如此。^{[39](P1)} 政府的推动使得妇女节分布空间得以扩大。就社会反响而言,档案显示的情况是四川各地的妇女节纪念大会“会场情绪颇为浓厚”,^{[37](P76)} “一般妇女对应有努力均有深刻印象,极感兴奋”。^{[37](P39)} 游行宣传时“观者如堵,途为之塞”,^{[37](P32)} “情绪热烈异常”。^{[37](P89)} 虽然言辞中难免有夸大成分,但多少还是表明国民政府在基层社会中的抗战动员取得了一定成效。

当然,真正能够说明宣传效果的不是节日纪念气氛,而是妇女为抗战作出的实际贡献。抗战期间,妇女群体为抗日救亡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一篇妇女节纪念文章就指出:她们(中国妇女)一方面尽着家庭的使命,另一方面更分担抗战建国的任务。她们的足迹踏遍了前方与后方:或救护伤兵,或慰劳战士,或制寒衣,或募

恤金，或教养难童，或动员群众。其勋劳的战绩，实为抗战史中最光荣的一页。^[40]

《大公报》也曾评论说：“女同胞为抗建大业出的人力财力物力确是空前的，妇女本身的进步已紧密地与民族战争凝结在一起。”^[13]我们可能很难明晰地判断不同的女性是因何种具体原因，自愿、无意识甚至不情愿地“分担抗战建国的任务”，其接受国家动员宣传的渠道也不止妇女节一途，但是，节日的相关纪念活动肯定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上述时人的评论出现在妇女节这一天，虽有塑造、宣传妇女进步与民族战争凝结在一起的意图，却也表达了公众对妇女贡献的肯定，呼吁社会的重视。

尽管应当肯定妇女节在宣传动员中的价值，不过若着眼于全体女性，具体情况其实很不一样。当时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冲击，许多下层妇女不得不面对越来越残酷的生存环境，对她们来说既无力也无暇参加抗日救亡的工作。^{[41](P179)}上文我们提到妇女节在空间上的拓展有利于节日内涵的传播，但并不能据此对妇女节纪念效果过分乐观，实际上理念接受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例如1939年桂林的妇女节纪念会上，一位炸年糕的老太太表示她知道“三八”节是妇女的节日，但不明白节日的意义。她认为这是知识女性的节日，因为会场里几乎都是女学生，都是“有学问”的人，而像她一样的劳动妇女是不敢来参加的。^[42]这位老太太的经历表明，妇女节的知识性、政治性特征不仅很难被传统妇女理解，还会使她们感到局促不安。同样的经历也发生在重庆一位普通老太太身上，媒体描述了她1945年被动员参加妇女节纪念大会的情况。据报道，当天开会时她一直站着，又累又饿，也听不懂台上嘉宾的演讲，感觉十分烦闷。她想回家，却发现会场大门已锁，无奈之下只有继续站到大会结束。老太太是靠苦力生活，收入是按天计，因参加纪念大会她浪费了一天时间，不仅受了累，还耽误了生计，最终给她造成了负担。^[43]

自身不愿参与、主旨深奥难懂甚至会场上的烦闷感，一起构成了两位下层老年妇女对妇女节的真实体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认知在下层劳动妇女中具有一定的共通性。面对政府强制推行的现代节日，传统妇女很难作出自主的选

择，她们只能以各自方式消极地加以应对。显然，妇女群体并非无差别的统一体，受过现代教育的女学生在其他女性眼中是如此的“特别”，而节日传播的理念又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彰显、扩大这种差异。

四、妇女节纪念的社会生活面向

妇女节除具有宣传教育功能外，还为人们提供了休闲庆祝活动，这也是其亲近民众的一面。受近代生活方式变迁的影响，妇女节有着不同于传统节日的休闲庆祝模式，这套模式在抗战时期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妇女节的休闲庆祝形式，首先是节日当天女性享有休假的权利。1937年以前妇女节并不放假，抗战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1939年，重庆市社会局通知所有女职员、女学生及女工放假半日，以便参加妇女节纪念大会。这一举措的出发点是，政府希望通过举办热烈隆重的节日活动来争取国际援助。^{[44](P1)}此后放假规定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体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社会生活属性。1941年，妇女节的假期延长到一天，而且女工可以带薪休假。^{[45](P6)}这种新的放假办法常见于大城市，中小县城也多加推行，如表1里中江县即为一例。1946年，行政院在全国范围内重申了带薪休假的命令，还特别强调它符合《工厂法》的相关规定。^{[46](P1)}如此一来，至少在制度上肯定了女性在节日当天的休假权利。抗战以前，国民政府公布的假期都是政治性纪念日 and 传统节日，现在社会群体性纪念日也包括在内，这体现出官方对后者的重视，客观上也为更好地宣传动员妇女广泛参与纪念活动提供了条件。

节日的庆祝活动还包括一些娱乐场所对女性的优惠。如节日当天，重庆各大影院或免费或半价招待妇女。^{[47](P1)}这种优惠很受女性欢迎，据记者报道，各娱乐场所都挤满了女性观众，^[17]甚至开会前人们仍津津有味地讨论着与电影有关的话题。^[48]其中一些家庭妇女一早就从郊区赶来观看，而因故错过的则深感惋惜，^[49]可见优惠观影颇能增加节日对普通妇女的吸引力。这些影片多与抗战有关，国民政府希望能寓教于乐，借此促进动员效果。各商店、书店也对女性顾客实行打折促销。节日打折最初出现于20世纪30年

代,^[50]抗战时期已成为惯例。如1943年的妇女节,重庆各大商店均对妇女实行优惠。^[51]在物价飞涨的战争年代,商品打折的吸引力可能较之以往更大。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相关活动也值得留意,如妇女工作者一般会在节日当天慰问出征军人家属,向她们赠送礼品。^[52]有些工厂则是自行组织一些娱乐节目来代替放假,如重庆印刷厂为女工举办游艺会,还放映电影。^[53]

上述休闲庆祝活动表面上看来似乎会侵蚀节日的主旨,实际上无论是实现战时动员的临时功能性目的,还是关于妇女节本身,这些活动至少有5个层面的价值。第一,如同纪念大会一样,休闲庆祝活动造成的人员聚集,能够拉近妇女之间的联系,具有凝聚群体认同意识的功能。第二,相关休闲庆祝活动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教育目的,例如放假便于人们参加纪念,观影则旨在寓教于乐,动员抗战。第三,从节日传播角度来看,休闲庆祝能增进妇女节对民众的吸引力,有利于其在社会上的传播,而一些相关行业,如电影业、零售业通过打折促销活动也参与到妇女节的纪念中,虽然他们可能不了解、不关心节日的意义,但至少使节日被更多的人所知晓,影响人群得以扩大。第四,休闲庆祝活动的社会生活面向,一定程度上使得节日成为现代化新型生活方式(比如看电影)的有效传播途径之一。第五,从当时的节日体系来看,政治性纪念日仅召开庄严的追悼仪式或革命史演讲会,传统节日则只作为人的休闲、庆祝时间。^{[54] (P271)}与之相较,妇女节与女性群体紧密结合,不仅传播理念,还融入休闲庆祝活动,形成了区别于政治性纪念日、传统节日的独特节日模式。既面向政治目标,又兼及社会生活,也是群体性纪念日之所以值得重视的原因。

五、结 论

在抗战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国家既需要妇女在实质上对抗战的生产、工作支持,也需要囊括妇女在象征意义上塑造全民抗战氛围。于是,大后方的妇女节不仅是专属于女性的社会时间点,它还结合了战争、国家与女性,成为动员妇女群体支持抗战的特殊场域,而国家、战争、性别三

者的互动,影响着节日纪念的走向。正是由于节日意义从妇女群体自身诉求上升到关乎国家、民族,妇女节在当时节日体系中的地位也有所上升。这反映到节日纪念的组织层面就是,出现了“三八”妇女节筹备会这样的固定机构负责纪念活动的组织、策划,而国民政府则会逐年拟定统一的纪念指导性办法。随着后方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节日纪念走向常态化。庄严肃穆的仪式,随处可见的标语、壁报,灵活新颖的宣讲、广播,至少在形式上,节日在更广的区域与更大的基层空间得到普及。此外,政府还在妇女节当天举办带薪休假、优惠观影、打折促销等具备生活面向的休闲庆祝活动,其直接效果是增加节日在社会上的吸引力,也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了妇女的群体认同意识,传播现代性的生活方式。

妇女节的这种变化对于妇女群体本身而言意味着什么?她们当然不是被动地为动荡时局、国家利益所左右,虽然在民族危机关头,自身群体诉求似乎理所应当让位。在服务于抗战的同时,立足于妇女群体的观点认为,支持抗战也是争取妇女解放的有利契机,认为两者合二为一、相辅相成。在不少女性眼中,她们积极响应国家动员,走出家庭参加各种抗日救亡的工作,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而从客观作用来说,这些在妇女节纪念框架下展开的凸显妇女特殊身份的种种支持抗战举措,对妇女群体意识在更大层面上被接受起到推动作用。当然,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思潮本身就带有混合包容的特征,它将妇女群体的独特要求与国家、民族的普遍利益结合在一起。但在抗战时期,借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来说妇女解放的思想倾向更为明显。

除承负上述政治功能外,妇女节也具备相当的社会意义。妇女节如同一场社会教育运动,通过动员妇女出席、有规律地举办纪念活动以及对节日主旨的反复申述,在固定的时间向人们传播着妇女解放和社会责任的理念,即强调国家、民族的未来,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以及新女性的责任。这些政治与社会理念具有相当的普适性,至今仍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注释：

- [1] 这些成果有陈雁《“三八”国际妇女节：中国妇女运动的特殊场域与公共文化空间》（《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2期）、魏建克《论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三八”妇女节纪念及其历史价值》（《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2期）、周蕾《革命、仪式与性别——国际妇女节的传入与国民革命时期的国际妇女节》（《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2期）等。
- [2] 这些成果有王丛丛《表彰与规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民节》（《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郭辉《传统的发明：抗战时期孔子诞辰纪念日研究》（《学术研究》2014年第7期）等。
- [3] 关于这一问题的初步探讨，参见任祖凤. 从职业困境到政治需求：民国时期教师节的国定化 [J]. 教育学报, 2015 (2).
- [4] 三月八日广州举行国际妇女节运动 [C] //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21 - 1927).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 [5] 何香凝. 回忆中国第一个“三八”节 [C] // 尚明轩. 双清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 [6] 鲍罗廷著，尤亚伟译. 国际妇女节与国民党 [J]. 新民国, 1924, 1 (6).
- [7] 为国际妇女节告女同胞书 [N]. 民国日报 (上海), 1929 - 03 - 08.
- [8] 沪妇女界昨开联欢会 [N]. 申报, 1934 - 03 - 09.
- [9] 今日国际妇女节 [N]. 申报, 1931 - 03 - 08.
- [10] 史良. 今年“三八”纪念中的特殊任务 [N]. 新华日报, 1938 - 03 - 08.
- [11] 何香凝. 纪念三八节 [N]. 新华日报, 1938 - 03 - 10.
- [12] “三八”国际妇女节宣传大纲 [Z].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053 - 0004 - 00170 - 0000 - 087 - 000.
- [13] 三八妇女节瞭望 [N]. 大公报, 1942 - 03 - 08.
- [14] 妇女节日敬告女同胞 [N]. 大公报, 1942 - 03 - 08.
- [15] “三八”妇女节宣言 [Z].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053 - 0004 - 00170 - 0000 - 068 - 000.
- [16] “三八”国际妇女节宣传大纲 [Z].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053 - 0004 - 00170 - 0000 - 064 - 000.
- [17] 如火如荼的“三八”纪念 [N]. 新蜀报, 1939 - 03 - 09.
- [18] 为庆祝抗战后第四个三八妇女节给全国各妇女团体的公开信 [Z].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053 - 0004 - 00170 - 0000 - 067 - 000.
- [19] 卢兰. 从川北农村妇女说起 [N]. 中央日报, 1941 - 03 - 04.
- [20] 纪念“三八”与妇女动员 [N]. 大公报, 1939 - 03 - 08.
- [21] 李德全先生今日对苏播讲中国妇运 [N]. 新华日报, 1941 - 03 - 08.
- [22] 关于颁发“三八”妇女节纪念办法及宣传要点 [Z].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051 - 0003 - 00275 - 0000 - 001 - 000.
- [23] 关于报告陪都各界纪念“三八”妇女节筹备大会会议经过情形上重庆市政府的呈 [Z].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053 - 0004 - 00170 - 0000 - 114 - 000.
- [24] 各界妇女昨日热烈庆祝妇女节 [N]. 大公报 (长沙), 1938 - 03 - 09.
- [25] 各地热烈举行“三八”纪念节 [N]. 新华日报, 1938 - 03 - 09.
- [26] 中国妇女之觉醒：西安举行之妇女节纪念大会 [J]. 良友, 1939 (141).
- [27] [法]莫娜·奥祖夫著，刘北成译. 革命节日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 [28] 寒波. 说三八 [N]. 中央日报, 1943 - 03 - 08.
- [29] 陪都妇女界昨热烈纪念三八节 [N]. 新蜀报, 1941 - 03 - 09.
- [30] 关于发动各区镇妇女参加“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给各区署的训令 [Z].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06 10015000300000026000.
- [31] 发动全体妇女参加纪念“三八” [N]. 大公报 (长沙), 1942 - 03 - 06.
- [32] 关于准时参加“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及报送参加会议情形的呈、训令 [Z].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0610015035860200131000.
- [33] 四川省部分县市政府呈报举办“三·八”妇女节情形与省府社会部代电 [Z]. 四川省档案馆. 档号民 186 - 01 - 0302.
- [34] 关于在北碚管理局澄江镇举行“3·8”妇女节并派妇女参加致北碚管理局澄江镇第一保保长办公处的通知 [Z].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081001000 0840000152000.
- [35] 关于翻印巴县蔡家乡各界妇女庆祝三八妇女节筹备会议记录致豫丰机器厂的通知 [Z].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20900050000081000.
- [36] 纪念妇女节 [N]. 大公报, 1939 - 03 - 09.
- [37] 四川各县县报三八妇女节遵办经过情形及加强统制同业公会组织情形 [Z]. 四川省档案馆. 档号民 186 - 02 - 0245.

- [38] 今日妇女节 [N]. 中央日报, 1942-03-08.
- [39] 重庆妇女界庆祝一九四九年国际妇女节大会宣言 [Z].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064000802680000029.
- [40] 纪念三八妇女节: 大时代中的中国女性 [J]. 良友, 1940 (153).
- [41] 李丹柯. 女性, 战争与回忆: 三十五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 [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3.
- [42] “三八”在桂林 [J]. 妇女生活, 1939 (3).
- [43] 开啥子纪念会, 白糟蹋一天工夫 [N]. 新华日报, 1945-03-14.
- [44] 重庆市社会局关于饬知 1939 年 3 月 8 日放假半日所以女生应列队参加妇女节纪念会的训令 [Z].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1530001200000022000.
- [45] 关于请转饬重庆市各机关、团体、商店、工厂在妇女节给女性职员、学生、店员等休假一日及领取薪工者照常发给的训令、函 [Z].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0860001002660000022.
- [46] 关于指示三八妇女节工厂女工放假工资发给办法给四川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的训令 [Z].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0560002001070000028000.
- [47] 关于转饬重庆市各影院、剧团、书场在“三八”妇女节上演抗建影片、妇女献身救国运动戏剧、歌词并折半收费的训令、通知、函 [Z]. 重庆市档案馆. 档号 00600014000850000019.
- [48] 热烈庆祝“三八”节陪都妇女界盛会 [N]. 新蜀报, 1942-03-09.
- [49] 三八花絮 [N]. 新华日报, 1943-03-09.
- [50] 沪妇女界昨开联欢会 [N]. 申报, 1934-03-09.
- [51] 陪都妇女界纪念三八 [N]. 中央日报, 1943-03-09.
- [52] 渝市妇女界今热烈纪念三八节 [N]. 新蜀报, 1939-03-08.
- [53] 今日妇女节女工增产不放假 [N]. 大公报, 1944-03-08.
- [54] [日]小野寺史郎著, 周俊宇译. 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Women's Day Celebration in the Rear Are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REN Zu-feng

(Department of Modern History,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Women's Day was not only the social time for women, but also the special field which aroused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ar.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festival celebration was focused on the interests and liberation of women, while it added mobiliz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aspec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he festival celebrati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vigorously popularized Women's Day in grassroots society. Many women participated in national salvation work. In their views, supporting the war was also a favorable opportunity for women's liberation. In the promotion process, Women's Day played a big role in social education. It conveyed a modern political and social philosophy to the people by the memorial ceremony and symbols, and provide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to the people.

Keywords: Women's Day; memorial ritual; social mobilization; public education; recreational activities